

《LOVE》：最簡單的藝術，最深層的人性

- 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前一陣子參觀了位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印第安納波利斯藝術博物館（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），館內收藏十分豐富，從歐洲古典繪畫到亞洲藝術品都應有盡有。然而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，卻是一件看似極其普通的作品：由當地藝術家羅拔·印第安納（Robert Indiana）創作的《LOVE》。這件作品簡單得近乎不可思議：四個英文字母，分成上下兩排，上面是 L 和 O，下面是 V 和 E，而 O 字則以四十五度角微微傾斜。相信許多人即使沒有看過原作，也一定在不同地方見過它的複製品。自從一九六〇年代面世之後，它早已成為全球最廣為人知的公共藝術之一。



羅拔·印第安納原名羅拔·奇勒（Robert Clark），出生於印第安納州，後來為了表示飲水思源，便將姓氏改為「Indiana」。《LOVE》的雛形最早出現在一九六四年，其靈感是「神是愛」這句話，當時他為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設計聖誕卡，以「LOVE」作為核心圖像。後來，這設計逐漸發展成版畫、郵票以及大型立體雕塑，並在紐約、波士頓、東京、新加坡等世界各地展出，最終成為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普及藝術（Pop Art）作品之一。1960年代末，很多人模仿者設計，印第安納試圖為其作品申請版權，但遭到駁回，理由是單字語不能受版權保護。

我理解為什麼有關當局不給予印第安納版權保護，確實這個字沒有獨特性。坦白說，若單純從技巧、結構或創意來看，《LOVE》似乎並沒有什麼驚世駭俗之處。它既不像文藝復興名畫那樣炫耀高超技法，也不像許多現代藝術般充滿高科技元素。它簡單得令人懷疑：四個字母也算是偉大的藝術嗎？在博物館裏，我曾經問過兩位導賞員，為什麼這件看似平凡的作品會成為世界級藝術品，但他們都無法給我一個清晰答案。

後來我慢慢明白，也許它真正的力量，正正來自它的簡單。二十世紀藝術其中一個重要方向，就是不斷刪減與簡化。從抽象藝術到極簡主義（Minimalism），藝術家一直在追問：當所有裝飾、技巧、象徵、敘事都被拿走之後，還剩下什麼？而《LOVE》幾乎已經簡化到極限。它沒有複雜故事，沒有艱深理論，沒有文化門檻。無論你是小孩、老人、教授、工人，甚至不懂英文的人，都能瞬間理解它的訊息。某程度上，它像十字架、和平符號、笑臉圖案一樣，以極度簡單的形式，承載了巨大的情感力量。

藝術史上，很多作品因為深奧而受到推崇，但《LOVE》卻走向另一個極端：它拒絕複雜，甚至拒絕解釋。然而，也許正因如此，它反而成為最能跨越文化與歷史的作品。當人們站在《LOVE》前面時，每個人其實都在觀看自己的內心，有人想到愛情，有人想到家庭，有人想到失去的親友，有人想到自己從未得到的溫柔。這四個字母像一個空的容器，讓每個人把自己的孤獨、渴望與記憶投射進去。它的偉大，也許不在於藝術技巧本身，而在於它成為了承載人類情感的共同語言。

此外，《LOVE》的誕生背景也十分重要，它出現於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國，那是一個充滿動盪與焦慮的年代：核戰陰影、越戰、民權運動、嬉皮士運動、婦解運動接連爆發。當時年輕人對權威與物質主義產生深深懷疑，因此，《LOVE》成為一種文化宣言，一種對抗仇恨與恐懼的象徵。

曾經有朋友與我討論，世界上是否存在普遍性的真理。我站在肯定的一方，朋友則抱持懷疑態度。我的理由其實很簡單：普遍的人性，會衍生出普世價值。人生下來就是社群動物，我們需要被理解、被接納，也需要愛與被愛。因此，任何長期建立於仇恨、猜忌與恐懼之上的意識形態，最終都會違反人性本身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《LOVE》之所以能跨越國界與文化並不是偶然的，它之所以歷久不衰，不是因為設計獨特，而是因為它觸碰到人類靈魂深處的共同訴求。

神學家保羅·田立克（Paul Tillich）在《生之勇氣》中曾經指出，現代人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恐懼，而是焦慮。恐懼往往有具體對象，例如害怕失業、疾病或戰爭；但焦慮卻是一種更深層、更難以言喻的不安。現代化與世俗化瓦解了傳統社會原有的穩定感，而個人主義則讓人孤獨地面對無數選擇與壓力。我們活在一個資訊爆炸、彼此連接卻又彼此疏離的年代。科技愈進步，人與人之間卻未必愈親近，我們每天接收無數訊息，但真正能安慰靈魂的聲音卻愈來愈少。

也許，這正是《LOVE》令人感動的原因，它沒有提出哲學理論，沒有政治口號，甚至沒有任何艱深語言。它只是極其安靜地，用四個簡單字母提醒我們：在人類所有文明、科技、權力與競爭背後，我們真正渴望的東西，其實從來沒有改變。當夜深人靜、繁華散

盡之後，人心最深處真正等待的，也許始終只是另一把溫柔的聲音，輕輕地對自己說：「我愛你。」

2026年5月14日

《LOVE》：最簡單的藝術，最深層的人性

原載於南加州版《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